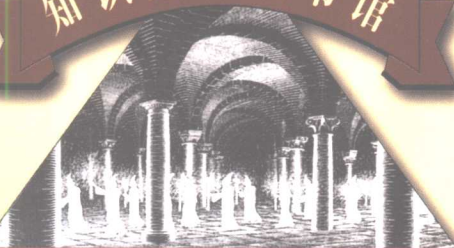


知识分子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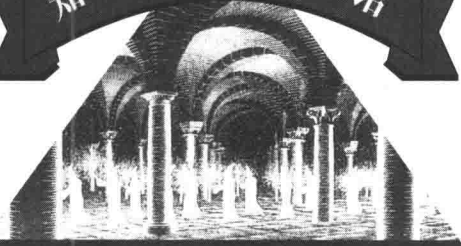
解构之图

〔美〕保罗·德曼 著 李自修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021
11025

知识分子图书馆



解构之图

[美] 保罗·德曼 著 李自修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构之图/(美)德曼著;李自修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195-8

I. 解… I. ①德…②李… III. 结构主义学派-文学理论-研究 IV. I7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58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4

字数:273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9.00 元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汪民安 张旭东 章国锋 谢少波

F238 / IP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萨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萨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焯、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 10. 于北京

前 言

如果真要为哲学撰写一个历史的话，解构主义无疑是它的最后篇章。尼采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哲学史的破折号，正是它打乱了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脚步，他将哲学拐进了另一个胡同，不过，海德格尔依然将尼采归入柏拉图主义的阵营，按照他的说法，在他之前的哲学史都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他的工作就是要结束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结束那种本质神学、理性陈述和二元思路，为此，他抛弃了对存在者的探究而改为追问存在本身，但是，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首要分子——眼里，海德格尔仍不彻底，海德格尔放弃了存在者，但他没有放弃追问，他没有放弃寻找和索求，而德里达则同时彻底地放弃了追问和追问对象，他砍掉了附加在文本上的所有额外枝桠，在多数时候，德里达通过文本来解说和证实他的学说：我们应该对文本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我们应该给文本充分的符号自治权，文本不应该置入到任何等级机制中，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所惯有的能指/所指等级制，文本并非如海德格尔所愿，它敞开一个世界，相反，文本根本就没敞开过，它只是在内部通过符号的相互追逐嬉戏而自得其乐，意义被德里达从文本那里驱赶走了，就此而言，神、理念、逻各斯、本质也从哲学中驱赶走了。

如果说，哲学史的尾声就是对它的起源给以致命一击的话，那么，德里达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埋葬了哲学学科本身，因为很难指望还有一种崭新哲学能更有力、更彻底和更充满仇恨地攻击柏

拉图哲学传统，哲学或许还没有死亡，但一种哲学形式肯定死掉了，德里达给哲学带来了灾难，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却给批评带来了福音：德里达以文本作为道具，他的写作本身带有浓厚的批评痕迹，德里达的文本具有文学和哲学的两栖特征，这一切都给文学批评新的机会，保罗·德曼的巨大身影正是在这一哲学和文学运动的过渡地带中浮现的。不过，此前德曼在美国批评界一直是个有力的存在，他大器晚成（41岁才拿到哈佛博士学位），50年代他步入美国知识界之际，新批评主宰着当时的文学领域，这令德曼有所不满，在他看来，新批评太缺乏哲学气氛了，它没有一种大的思想背景作为支撑，新批评浓厚的技术倾向使其流于雕虫小技。德曼的兴趣长久以来一直留驻在欧陆思潮里，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哲学家了，德曼本人就是为数甚少的有欧洲哲学素养的批评家，他很早就利用过萨特和胡塞尔的理论来解说文学，他也感慨海德格尔在美国所遭受的冷遇，为此，德曼一直耐心地寻找机会将欧洲思想嫁接到美洲大陆来。

1966年德里达的美国之行成全了德曼，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全了德里达本人。当时，美国理论界正打算欢呼一位年轻的结构主义使者，他们准备在美国全面推行结构主义浪潮，然而，德里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却出人意料地诋毁结构主义及其领袖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宣称，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结构中心，结构是没有等级制的，在结构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具有优先性，结构勿需追根溯源，此在总是被自由嬉戏所化解，自由嬉戏是空缺和此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某种非中心化力量，是某种不确定性的永恒动力。德里达完全动摇了稳固的结构主义秩序基础，结构主义的理性等级制度被一种充满活力的差异力量所搅毁。德里达出人意料然而又是新鲜的说法完全搅动了美国知识界的神经，更重要的是，这一说法正巧同当时的美国文化环境合拍——60年代正是美国生机勃勃的造反时代，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自由嬉戏时代，正是一个欢快的激进政治时代、一个无所不为的弑父时代

和说唱时代，此时，鼓吹运动、差异、嬉戏和无政府主义的解构哲学的突然光临，正好发生逢其时。

如果说德里达在美国播下了解构主义的种子，德曼则催其发芽。这两个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相遇是解构主义的一个决定性事件，也可能是这个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理论事件之一，他们的合作，造就了解构主义的声势和力量。德曼促成了德里达一年一度的耶鲁之行，并团结了他的耶鲁同行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这个小集团很快扩张了解构主义的势力，他们四处散布解构主义学说，并向耶鲁博士灌输忠诚解构的信念。这些耶鲁博士毕业后涌向全国，他们有效地控制着一些文学系，将解构这个响亮的字眼搬上讲坛，终于，解构主义像一场大火在美国各地燃烧起来，它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理论风暴，德里达和德曼的大名迅速地成为媒介的中心词语。

然而，德曼的声名并不是作为解构主义运动的组织者而奠定的，他同样也不是作为一个德里达的解释者而著称于世的，相反，德曼也许是这个解构运动中惟一堪与德里达比肩的人物，德曼倡寻了文学领域中的解构主义批评，这一行为意义重大，它既扩大了哲学的势力，又将批评——准确地说，是阅读——恢复了哲学的尊严，同时，德曼的身体力行奠定了一种批评典范，一种不同于德里达的文学实践典范，正是德曼的批评而非德里达的批评铭刻在解构主义文学活动的功劳簿上。

德曼的批评写作似乎比德里达更讲究一些规则。德里达为数不少的批评写作离奇古怪，它们似乎无章可循，然而，在德里达看起来有些恍恍惚惚的行文和思想历程中。却充斥着令人着魔的魅力，他的异想天开总是同一种伟大的创造纠集在一起，他的胡说八道总是窝藏着惊人的发现，面对文本，德里达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操纵力量，他随心所欲地支配、使唤和摆弄它们，奇怪的是，这些文本并没有因为德里达的无所顾忌而暴露出它们顽强的惰性，它们确实顺着德里达这只不可捉摸的手交出了它们尘封已久

的秘密，不过，这些秘密决不是文本的外向指涉意义。德里达的批评实践主要是来证实他的哲学想法，他并没有孕育一套系统的阅读模式，而且，德里达对文本的处置表现为一种独创性的天才风格，它是不可效法的，他只能离群索居，而作为一个流派的领头羊的位置，只有保罗·德曼是当之无愧的：他既对解构主义批评作了理论上的指导，又通过卓越的实践为这种批评活动提供了样板。

德曼毫不犹豫地反对文学研究中的内外指涉关系。在他看来，将文本中的词语系列匆忙地和一个外在意义搭配在一起，显然忽略了文本中语言的文学维度，这一点，法国的符号学功不可没，他们借助语言学，尤其是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来揭示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这就使批评和阅读放弃了劳神费力的释义重负，文本内在的语言制度得到了充分的揭示。然而，对德曼来说，法国的文学符号学做得还不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语言中语法结构和修辞结构的差异，法国的理论家让语法和修辞在功能上保持完善的统一，并一帆风顺地从语法结构过渡到修辞结构，对他们来说，修辞仅仅是语法模式的一个特殊子集，修辞往往是一种特定的组合关系，一种变相的另类语法形式，句法总是能将修辞吞没到自己的秩序组织中来，因此，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叙事学总能在文本中找到一个无往不胜的语法网络，文本不论怎样活跃，它总是被语法关系所罩住，这样，文本本质上还是一个充满惰性的稳定组织。

德曼提出了完全相左的意见，语法和修辞并不是那么团结一致的，它们之间埋伏着一道跨不过的横沟，修辞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被语法所招安。语法真正的共谋者是逻辑，它们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默契而一致的真命题。然而，修辞，德曼引用博克(Burke)的说法，乃是对语法模式中符号和意义达成一致性关系的某种辩证的破坏，修辞始终是语法的一个捣蛋鬼，对语法而言，修辞总是一个不和谐音；同样，皮尔斯也强调语法和修辞的差别。皮尔斯坚持认为，解释符号并不等于为它找到一个寄居的意义，不

是为它解码，解释符号乃是用另一符号来指代它。这样，对符号的解释势必会引出一串无穷无尽的符号链，皮尔斯称这种“一个符号产生另一个符号”的过程为纯修辞，他以此来区分那种“符号直达意义”的纯语法。

德曼支持语法和修辞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的看法，他提出了语法修辞化和修辞语法化两种不确定的表意模式，前者是在一个完全清晰的句法模式里，由于修辞的介入，这个句法却滋生了两种无法把握乃至完全对立的意义，它表明了语法并非是单一意义的源泉，语法并不能给文本释义提供可靠的保障，文本也不仅仅只有字面上的意义来源，修辞在此开辟了令人眩晕的指涉偏误的可能性。后者则是在频繁的修辞使用中却暗含着语法的力量，隐喻通常依赖换喻而前行，文本在随心所欲中似乎依稀遵循一个语法航向。语法和修辞在一个文本中的相互交涉共同导致了意义的模棱两可性，文本现在是不可知的，它充满着悱恻、矛盾、冲突，总之，它封锁了通达外在意义的道路，语法义（字面义）和修辞义在文本内部展开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德曼就此搞垮了文本的指涉秩序，他断言，文本不再给我们敞开一个确定的意义了，阅读所产生的情感恰恰是因为对文本，对语言的不知所云而产生的焦虑或喜悦，而不是对文本具体所言的强烈反应。德曼几乎是在笼统的意义上使用文本和语言的，这就使得他的说法看起来具有普遍性，文学、哲学、批评，这些都是由语言组织起来的文本，毫无疑问都分享他的理论套路，就此，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们没有什么大的区分，它们都承受着语法和修辞的相互折磨，它们都不会给人以清晰的意义，而哲学多少年来都被错误地对待，事实上，它既不昭示真理也不启智，修辞总是在暗中破坏它的逻辑和语法基础，哲学以及哲学史一直都在掩盖着它的虚假性，从头至尾，哲学都是个骗局。文学无疑老得多，它承认自己天性中的欺骗伎俩，它承认它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它承认它的自我解构本能。这里的重心不再是文学的虚构性了，而

是德曼给我们的迎头一击：哲学也是虚构性的。那些打着纪实的旗号，宣称要裸露自己灵魂的忏悔录更是一种虚妄的托辞。

德曼将卢梭搁在了他的解构主义手术台上。那也是他的一个批评实践范例。卢梭的意图是对其过去的过失进行忏悔，而德曼则试图证实他的忏悔却生长出一种相反的辩解因素。卢梭在《忏悔录》中回忆他在都灵做仆人的时候，盗窃了一条丝带，当盗窃被发现时，他却栽赃给一位女仆人，是那个女仆人给了他这条丝带，言外之意是她想引诱他，而且，他还当众伤害了这个无辜姑娘，事后，卢梭一直在意味深长地考虑，这次诬陷将会对这个名叫玛丽永的姑娘造成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然而，在德曼看来，卢梭的忏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的反面——辩解。因为忏悔是以真理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它凭借对事物真面目的申明，凭借对罪感的自我暴露，而获得一种补偿性的心理平衡。然而，在叙述那个情节时，德曼发现，卢梭并不使自己仅仅局限于陈述“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他还在进行议论，他在强调他忏悔的力度和深度，而这，在德曼看来，恰恰就是一种开脱罪责的辩解，因为忏悔仅仅是一种言词，不是现实领域中一种实实在在的补偿行为，它通过言词上的自我指责，事实上也就摆脱了罪责，甩掉了愧疚，因此，我们实在拿不定，卢梭到底是在开脱、辩解，还是在忏悔？词语的两面性在此暴露无遗：忏悔话语和辩解话语难解难分，它们潜伏在同一段字词下面摇摆不定。

德曼还惊人地发现，隐喻也是卢梭由忏悔话语滑向辩解话语的一个生动道具。故事中的丝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能指——它离开了法定主人，也就成为一个无依附的能指。这个纯粹的空能指由于被置入到一种偷盗语境中，就变成一个交换和连结财富锁链的枢纽，并沿着一条交换路线游动，而卢梭宣称，他正是准备将这条盗得的丝带交给玛丽永，于是，德曼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个丝带能指指代着卢梭对玛丽永的欲望，它是欲望的替代品，或者毋宁说，指代着两人彼此间相互流动着的欲望，正是这种双向性，

使卢梭有理由诬陷这根代表欲望的丝带是玛丽永送给他的，这一诬陷说法无可避免地成为卢梭盗窃行为的又一替代，于是，这里接着展示了双重替代：丝带替代一种欲望，这一欲望（卢梭对玛丽永的欲望）又被另一种欲望（玛丽永对卢梭的欲望）所替代。而替代恰恰是隐喻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事件正好是一种连续隐喻话语实践，它所产生的辩解结果（卢梭说是因为他想把这条丝带送给玛丽永才盗窃的）严重地损害了忏悔话语的严肃性，至此，德曼再一次巧妙地搬来隐喻证实词语的含混性。

德曼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上述介绍不过是这篇典范解构论文的部分手段——阻止卢梭一厢情愿的虚假忏悔。德曼在他的解构式阅读中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点，任何一个细枝末节，正是通过机智地利用它们，德曼使得词语的明确指涉性能陷于瘫痪，意义被悬置了，文本陷入没完没了的内讧中。然而，德曼在挖掘文本的歧义时，自己却充满着自信，他通常使用一种决断的口气，一种无庸置疑的语调，一种权威修辞，他从一个判断马不停蹄地过渡到另一个判断，他不作说明，不作细部解释，不作确凿论证，甚至不太用关联词句，德曼的写作是坚定的、自信的、有力的、决然的、巧智的，同时又是省略的、偷工减料的、匆匆忙忙的，甚至有时是支支吾吾的，德曼的论文表现出一种简约主义风格，其巨大的智慧蕴藏在一种简短的断言中，他对确定性的极端怀疑，他对事物本身的意外洞察，他拉牵着文本跟随着他前行的力量，他判决对象时流露出的果敢，他对他这项批评伟业的勃勃雄心，永远是解构主义活动中最响亮的声音。

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德曼的写作一直在驱赶历史的幽灵。首先，他从不将历史带入他的批评实践中，对文本而言，历史不是一个功能，不是一个权力源泉，不是一个因果绳索，甚至不是一个稀薄的氛围，历史和文本各自居住在互不相干家宅里，它们彼此互不骚扰，毫无往来，历史不再是文本的背景了，它消失于文本的界域之外，德曼赋予文本以一种巨大的权威感：文本完全依

靠自己运转，它饱含着一种自足性力量，这种力量以一种自我分解的形式出场，它是文本的一切源泉，就此，历史永远地退场了。在另一层意义上，德曼同样在驱赶他自身的历史，他青年时代（1941年）用一篇反犹太主义的语言写过一篇文章，无疑，这种莽撞、冲动、幼稚永远铭刻在德曼的历史上。这样的一种文章永远抹不去它的历史氛围，永远抹不掉它的指涉意义，它成为德曼的一个历史幽灵，也成为反解构主义者的攻击口实，他们指责解构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血缘关系，他们一同搅毁这个平静世界，损害这个世界的和谐、统一、平衡。然而，有更充分的理由证实解构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对抗性，法西斯主义将犹太人想象为一个绝对的对立面，他们各自占据着二元论哲学的一端，通过对犹太人的排斥、区分和等级圈定，纳粹确定了他们的优先性，借助于这种哲学迷信，纳粹对其对立面进行一种本质主义的迫害，纳粹主义完全是一种行动中的中心主义哲学，而解构主义正是在不屈不挠地反对等级制、中心制、对立论及其各式各样的派生名堂，它旨在摧毁任何政治迷信和哲学教条，旨在摧毁想当然的仇恨、对抗和冲突——如果说德曼年轻时一度陷入“盲目”的话，那么，“解构”也许正是经由这种盲目而达成的“洞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解构主义潜在的民主政治观。

德曼的一生，是在文学和哲学中徘徊的一生。很少有哲学家像他那样熟悉华兹华斯、济慈、雪莱、荷尔德林和波德莱尔，也很少有批评家像他那样熟悉黑格尔、席勒、尼采和海德格尔，德曼以一种巨大的勇气用修辞理论驾驭这些伟大的姓名，他从不跟在这些姓名及其庞大的思想后面，他不对他们俯首称臣，相反，他用他的理论蚕食他们，消化他们，揭露他们，他发现这些巨型思想的秘密，意义生产的秘密，最终，不过是些语言的秘密。

汪民安

1997.12